

石介交游考

李 峻 岫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镇南军掌书记、嘉州军事推官。以内外艰去官，躬耕讲学于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服除，入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四《徂徕石先生介墓志铭》，简称《墓志铭》）。介与孙复、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是为宋学之先驱。有《徂徕集》^①二十卷传世。具体生平可参见许毓峰著《石徂徕年谱》^②。石介生平交游颇广，对其交游群体进行考证，既可藉以对石介个人的思想性格有更深入的了解，亦可蠡测当时之士风趋向。本文就其本集诗文所及及相关资料，将其交游对象大致分为门生师友与宰执宦僚两大群体分作考证，详略一以所见资料为准。

一

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四举进士不第，石介为其筑室泰山之阳，以《春秋》授学，称富春先生，亦称泰山先生。范仲淹、富弼以其有经术荐之，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累迁殿中丞。后因孔直温事坐贬虔州监税，又知长水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后稍迁殿中丞，卒。今存《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及《孙明复小集》（《宋史》卷四三二

《儒林传二》)。

孙复与石介的师生情谊开宋儒尊师重道风气之先，石介也一直以泰山门人的身份出现，但他结识孙复的时间并不早。《徂徕集》卷十六《与裴员外书》云：“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来南都，又逢孙明复”，“来南都”指石介景祐元年（1034）为南京留守推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八月庚午条，以下简称《长编》）。故孙复与介相识即在此年，时介已三十岁。卷三《寄明复熙道》诗云：“今春来南都，明复去京辇。未识心相通，所怀恨未展。明复无羁缚，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访我殊不倦。剧谈露胸臆，胸臆无畔岸。”由此可知石介来南京之后已闻孙复之名，但未得相见。后孙复来南都访介，二人一见如故。景祐元年介又作《上孙先生书》（卷十五）。称孙复所作赠己之诗“攘臂欲操万丈戈，力与熙道攻浮伪”是“得介之心”，并云“主斯文，明斯道，宗师固在先生与熙道”。景祐二年冬，石介为孙复筑室于泰山，作古诗《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洄明远、楚丘李缙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卷二）以记之。诗云：“吁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辈同扶持……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慨然以道济天下、拯救时弊为己任。石介此举在师道久敝的宋初无疑有开创之功。《澠水燕谈录》中称述石介“访问见解，日夕不怠”，“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屨以待”，“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引，今本《澠水燕谈录》无此条）。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亦云：“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五）康定元年（1040），石介作《泰山书院记》（卷十九），尊孙复为泰山先生。同年，石介又作《上杜副枢书》（卷十四），向当时刚拜职的枢密副使杜衍荐引孙复^③。庆历二年，介入为国子监直讲，^④为孙复作《明隐》篇（卷九），荐其

入朝。同年十一月孙复以泰山处士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长编》卷一三八）。这对于一心想拯救文弊，重扬道统的孙、石二人，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利的时机。二人“力相赞和，期兴庠序”，后“来者日众”，于是扩建学舍为太学，“介、复辈益喜，以为教道之可兴也”。但这种景象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石介病逝及新政失败，太学的改革也随之夭折（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士建中 字熙道。全祖望《札记》云其“大名府魏县人”^⑤。宋刘跂为其孙士补之撰墓志铭，载其先世甚详（《学易集》卷八），据之，其当为郛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无疑。正史无传，但天圣、庆历间号称“东州大儒”^⑥，《宋元学案》卷六将其列为“泰山同调”，云“孙泰山讲学，先生同时而起”，甚为介所推重。“其后以进士授评事，宰魏。不知其官爵所止。”《宋史翼》卷二三据刘跂《士补之墓志铭》，言其累官评事知魏县，官至尚书兵部员外郎。

石介将士建中引为同道，《与士建中秀才书》（卷十四）云其乃“先民之觉者”，自己要追随之，庶几可至于道。卷六又有《与士熙道书》，言“四月十二日明复至”，又言将与孙复同往泰山，知此时石介刚结识孙复，当即景祐元年（1034）石介方任南京留守推官所作。后又言“京东、河朔异属，我守官在东，熙道在北，有大幸会，恐二年间未得相见也”，知此时士建中刚解褐知魏县，故推知其为景祐元年进士^⑦。石介《代郛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卷二十）称士建中为“今秋得解进士”，知其当作于景祐元年前一年，即明道二年（1033）。据此表所言“建中今三十六岁”知其生于咸平元年（998）。表中称建中“经术深明，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因其不工时文，乞令试策。此后不久，石介又先后向范思远、蔡齐等人上书极力荐引士建中（《上范思远书》及《上蔡副枢书》，卷十三）。石介为士建中延誉再三，多方援求，可谓用心良苦。《与士熙道书》言：“吾受刚正直烈于天，受中于熙道。刚正直烈

得中然后谓之道，不得中无所成人。”《上蔡副枢书》称述“其道则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则柳仲途、张晦之之文也，其行则古君子之行也。”推崇之至，寄予之深，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所谓“同道之谊”。居官低微的石介希望士建中能得以重用，藉以实现自己重振儒道之理想。但士建中终未宦达，似有负石介之望。

姜潜 字至之，石介门生。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从孙复读《春秋》，从石介学《易》于徂徕山。召试学士院，为明州录事参军。后荐为国子监直讲，神宗时曾访以治道。卒年六十六（《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传中》）。

据《石氏墓表》（《徂徕集》附录一“佚文”）知其为石介侄女婿。景祐元年（1034）介《上孔徐州书》（卷十四）（参见本文“孔道辅”条），为其延誉，言“其人存心笃道，好学服善，乐死忠义，能守志节”。宝元元年（1038）石介赴嘉州途中作《赴任嘉州，初登栈道，寄题姜潜至之读易堂》诗（卷四）。诗云“连云栈外四千里，读易堂中一轶书。慈母含饴垂秃发，先生怀道接茅庐”，言语之间可以看出石介对姜潜的推重与勉励。二人亦师亦友，关系比较默契。

杜默 字师雄，石介门生。熙宁末，特奏名，仕新淦尉（《宋诗纪事》二七）。关于其籍贯，《渑水燕谈录》卷七、《宋诗纪事》俱称其为濮州（今山东鄄城）人。清朱筠因其所见石介文集载《三豪诗送杜默归历阳》诗题，便断定杜默为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笥河文集》卷七《和州梅豪亭记》），缺乏依据。石介之门生多山东士人，且多濮州人氏，故杜默当即濮州人。

石介有《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卷二），据诗中所言“曼卿苦汨没，老死殿中丞”，知此诗作于康定二年（1041）二月石曼卿卒后（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四《石曼卿墓表》）。朱筠据石介诗序“本朝八十年”确定此诗作于康定元年（1040），当误，此处“八十年”当为概称。此诗云“师雄二十二”，则杜默当生于

天禧四年（1020）或五年。诗中将“杜师雄之歌篇”与“石曼卿诗”、“欧阳永叔之文辞”并称为“三豪”，对杜评价甚高。《宋诗纪事》云其有送石介诗“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及“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句。苏轼观后甚不以为然，批评曰：“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东坡志林》卷一）可见其为人作诗亦豪放狂怪一路的。

· **张绩 李常** 俱为石介门生。介有《送张绩李常序》（卷十八）。据此可知，张绩字禹功，李常字遵道，皆濮人。据介文中“予今年三十七”句及文末题署知此文作于庆历元年（1041）。又，文中云“禹功少予十四岁，遵道少予十五岁”，则张绩当生于天禧三年（1019），李常当生于天禧四年（1020）。二人于是年去举进士，故介作是序以赠之。石介甚推重张绩，曾作《赠张绩禹功》诗（卷二），云：“禹功气奔壮，方今二十二。……更加十四年，世应绝俦类。”石介又有《赠李常李堂》诗（卷三，李堂亦介之门生，见后文），以“一举一万里，志气不可量”勉励二人。《澠水燕谈录》卷七云：“濮人李植成伯与张績禹功师徂徕石守道，为门人高第。欧阳文忠《读徂徕集诗》云：‘常績最高第，騫游各名科’（成伯少名常）。”（按：周必大庆元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亦作“績”，但据《徂徕集》，“績”当为“績”之形讹^⑧）古人名、字意义相关，改名后一般改字，名植字成伯与名常字遵道意义上都较为相合。且李常与张绩常并提，则李常当原名常，字遵道，后改名植，字亦改为成伯。又据《澠水燕谈录》此条，知李常嘉祐中被举，诏书方下而卒。

李堂 石介门生。介有《赠李常李堂》诗，俱赞濮州人氏，则李堂亦为濮州人。又据《送李堂伯升病归》诗（卷四），知其字伯升。李堂在徂徕山求学时因病重而返家，石介曾作诗赠别。《伯升病，君逢、遵道送归》（卷四）诗云：“知心古道谁相得，洒泪东

风自觉非。早到茅庐慰孤淡，《易》爻重待共参微。”则李堂应是石介高足，常与石介讲《易》论学。

祖无择（1011—1084）^⑨字择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宝元元年（1038）进士，授承奉郎通判齐州，年余召试充直史馆，累官直集贤院。出知袁州，以兴学著称。少从孙复学经术，从穆修为古文。为文甚著，有《龙学文集》十卷（《宋史》第三三一本传，参《龙学文集》附《龙学始末》）。

祖无择通判齐州时，石介曾作《与祖择之书》（卷十五），恳求祖无择藉其居官之尊荐引孙复。《龙学文集》卷七有《上安抚张杂端荐孙复牛仲容书》，其注曰“初任齐州通判，居官十有一月作此书”，知祖无择在得介书后曾荐引过孙复。石介康定二年（1041）作《送祖择之序》（卷十八），言择之“罢济南，将归阙，自历山南走三百里，别明复先生暨予于泰山、徂徕”，又言择之“此去近天子”，“官日进而宠日深”。又，祖择之宝元元年授承奉郎通判齐州，年余召试充直史馆（《龙学始末》）。据此，此文当作于祖由齐州赴朝充直史馆之时。序云祖择之与石介、孙复“相与讲道德，究经术，耽云霞，玩水石，举觞赋诗”，又言“择之与予，说蕴深矣”，知二人相知不菲。

刘牧（1011—1064）字先之，一作牧之，号长民，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以范仲淹为师，又从孙复学《春秋》，与石介为友。曾任兖州观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馆陶县。累官荆湖北路转运判官（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九七《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刘牧将仕知馆陶县之前，石介作《送刘先之序》（卷十八），表达自己对宋初古文家柳开（字仲涂）的极力推崇，“仲涂之道，孔子之道也”，并希刘牧能于馆陶扬仲涂之道。

李缙字仲渊。据卷三诗《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洄明远、楚丘李缙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

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知其为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人。《宋元学案》卷二言其为邳州人，为龙图阁学士李绚之弟，未知何据。缙师孙复。据介《朋友解》（卷八）知姜潜居于奉符太平镇时，某夜大水至，几没其家，时缙为兖州奉符县尉，率弓手营救，因以私役人获罪。介因作是文，称其朋友之义。据介《上范经略书》（卷十七）知李缙后因不善事上官，被诬损官钱数缗，除名羁管滁州。介因有《寄李缙仲渊》诗（卷二），以屈原、贾谊被放拟之。康定元年（1040）介作《上范经略书》（卷十六），向范仲淹荐引李缙，时李缙尚羁管滁州。

石介门生还有张洞^⑩、莫说、马默、何群、苏唐询、徐遁、高拱辰、赵狩、孟宗儒，俱见《宋元学案》卷二“徂徕门人”。又有马随、石介弟石会、石合，侄石愚、石淳、石沆等俱见《宋元学案补遗》卷二。

二

孙奭（962—1033）字宗古，博州博平（今山东聊城）人。以经术仕进，守道自处，不阿附取容。累官至龙图阁待制，以太子少傅致仕。治五经，奉诏与邢昺等校定诸经正义（《宋史》卷四三一本传）。

据《长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1031），翰林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孙奭始知兖州。天圣十年春，孙奭主持疏济故道，时介任郓州观察推官，亦曾参与此事。景祐元年（1034），时孙奭已卒，介撰《新济记》以记之（卷十九）。介又有《上孙少傅书》（卷十五），言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大道荒芜，而圣人之道则“在于阁下”，表达了从孙奭而学之愿。孙奭卒后，介因“彼浅近者……以己度人，群然谤公”，为之作《释疑》及《孙少傅致政小录》（卷九）。从这两篇杂著中可以看出石介深得孙奭之信赖，二人关系比较融

洽。据《孙少傅致政小录》，孙奭致仕归郾州后，大宴郡寮于私第。宴毕，独留张舜元、石介于致政堂中“与公乡里道旧款曲”。临终孙又请介为其草遗表。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李迪（971—1047）字复古，濮州（今山东鄄城）人。历真宗、仁宗两朝，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同平章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卷三一〇本传）。石介有《谢兖州李相公启》（卷二十），感其衣食一己之德，赞其衣食天下之厚。据《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夏四月辛酉朔，新知兖州李迪加资政殿大学士”，《宋史》本传知李迪自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元年（1041）知兖州^①。据介《贤李》篇（卷九），李迪于此间曾拜访孙复于泰山。庆历元年李迪将其侄女许配给孙复（据《贤李》篇知时孙复年五十，故断为今年）。《贤李》一文即专为此而作。

杜衍（978—1057）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庆历间与范仲淹、韩琦、富弼革除弊政，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三一〇本传）。

康定元年（1040），杜衍始拜枢密副使（见③），石介作《上杜副枢书》（卷十二），称述杜衍“魁礪骨鯁，纯忠大节”，但“难逢者时，难得者位”，石介希其能惜其时，惜其位，行道于天下。后介又复上书向其引荐孙复（见前文“孙复”条考证）。庆历二年（1042），杜衍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因介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不召。欧阳修因作《上杜中丞论举官书》，责杜衍“自信犹不果”，但杜衍最终未能采用（参见后“欧阳修”条）。庆历三年国子监直讲石介因杜衍之荐拜太子中允（《墓志铭》，参《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三八）。庆历五年七月，石介既卒，范仲淹、富弼以党论相继罢出宣抚，杜衍则罢知兖州。时有诏下兖州核介之生死虚实，杜衍保介必死，使其暂免身后之祸（详见后“龚鼎臣”条）。景祐二年杜衍荐石介举官事使其不免有阿主妒贤之讥^②，但从其再三荐引、维护石介来看，杜衍对介还是

比较惜重和爱护的。

王曾（978—1038）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人。真宗初崩，朝廷倚以为重。仁宗时累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尝出知青州，知天雄军。景祐二年（1035）封沂国公（《宋史》三一〇本传）。

据石介《上王沂公书》（卷十四），王曾知青州及后移镇大魏，道出于郛时（时介为郛州观察推官），介都拜会之，王曾“教以仕宦为政之大方”。介为作《题郛州学壁》（卷九），记王曾在青州、魏、郛州立学之事。又有《上王枢密书》，《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条载此书。时王曾刚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石介立即上书言仁宗废后，涵淫失德，希王曾以此为谏，开悟圣听。景祐二年介上书论敕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帝赫斯怒，祸在不测”（《上王沂公书》），幸王曾从容解救，方使之不置于法。^⑬

夏竦（985—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历仕真宗至仁宗朝，累官枢密使、参知政事。与王钦若、丁谓相朋比，当时并称为奸邪（《宋史》卷二八三本传）。

景祐二年（1035）夏竦知南京应天府（据王珪《华阳集》卷四七《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石介有《上南京夏尚书启》，云“会公之来，喜抃交并，精爽飞越”。又为之作《移府学诸生》、《南京知府祈晴文》等文（俱见卷二十），颂其“行圣师之道”，可见当时二人关系还不错。庆历三年（1043）三月，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同时执政，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并为“四谏”。石介大喜，乃作《庆历圣德颂并序》（卷一），称夏等为“妖魅”、“大奸”。夏竦恨之，且欲倾富弼等人，乃令女奴阴习介书，伪作介为弼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富弼、石介皆不自安，请出于朝。庆历五年介卒后，孔直温谋反，于其家得介书，夏竦因诬介诈死，北入契丹密谋起兵。朝廷因下诏兗州验介生死虚实。庆历七年，夏竦复进谗言，介险遭斫棺之难（据《长编》卷一五〇、

卷一五七、卷一六〇)。

孔道辅 (986—1039) 字原鲁，初名延鲁，曲阜人。孔子四十五代孙。祥符中进士及第，补宁州推官。曾以笏击蛇。石介为之作《击蛇笏铭并序》(卷六)，赞其不畏妖惑、纯刚正直。明道二年(1033)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因谏废郭皇后事于景祐元年(1034)二月出知泰州，居数月知徐州，又徙知兖州，在兖州三年。复入为御史中丞(《宋史》卷二九七本传，参《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条)。

明道二年孔道辅首拜御史中丞之后，石介作《上孔中丞书》(卷十三)^⑭，介以“中丞之任特重”谏之，以“刚正不折”励之。景祐元年孔道辅知徐州时，介又作《上孔徐州书》(卷十四)，以孔为圣师之后，希其能兴复儒道，并致自荐之意。介又有《明孔》篇(卷九)，言孔道辅知兖州时尊事孙复，并“岁时送衣服、肴醴、薪刍、麦稻不阙”。石介亦当因此机会与孔来往颇多。介又有《寄孔中丞》(卷四)诗，云：“谏署峥嵘有旧名，侯藩偃息政方成。张纲昨日弹梁冀，文帝今朝召贾生。”从诗意来看此诗当作于孔道辅宝元元年末复入为御史中丞后(《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十二月甲戌条)。宝元二年十二月，孔道辅贬郢州，行至韦城，发病卒(《宋史》本传)。介作《祭孔中丞》文(《徂徕集》附录一“佚文”)，赞其忠诚之节。

范仲淹 (989—1052) 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事迹甚著，从略。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知其自天圣五年(1027)掌南京府学。又，石介为举子时曾寓学于南都(《宋朝事实类苑》卷十二)，则介与范实有师生之谊。石介有《上范经略书》(卷十六)，荐举姜潜等门生。庆历三年(1043)三月，石介喜作《庆历圣德颂并序》(参前“夏竦”条)，云“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时韩琦与范仲淹正自陕来朝，于道中得此颂，范拊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琦曰：“天

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孙复闻之，亦曰：“石守道祸始于此矣。”（袁褰《枫窗小牖》卷上）庆历三年七月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长编》卷一四二七月丁丑条），欧阳修等力引石介为谏官，范独曰：“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异，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主上富春秋，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宋名臣言行录》前卷七）可见虽然当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之风乃“自仲淹倡之”（《宋史》卷三一四本传），但范仲淹反对石介过于激切、矫厉的作法，因为这样只能阻挠新政。

石延年（994—1041）字曼卿，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其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仕至太子中允（《宋史》卷四四二本传）。

石介《与士熙道书》（卷十六）云：“四月十二日明复至，十八日石曼卿学士来，始得兄书”，知石延年与孙复、石介俱有交往。介有《读石安仁学士诗》（题下注：曼卿旧字安仁）（卷四），以“秋风有怒涛”句誉其诗。介又有《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并序》（卷二，见“杜默”条考证），称其“豪于诗”。

《徂徕集》卷十八有《石曼卿诗集序》，苏舜钦《苏学士文集》亦有是文，且文末题“康定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数字^⑤。苏舜钦有《哭曼卿》诗（《苏学士文集》卷二），云：“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高歌长吟插花饮，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恸哭来致奠，忽欲出送攀魂车。”石延年卒于康定二年，则二人曾于康定元年饮酒欢会。又，《石曼卿诗集序》云：“（石延年）一日觞予酒，作而谓予曰：‘子贤于文而又知诗，能为我序诗乎？’予应曰：‘诺。’遂有作。”石延年康定二年二月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卒于京师，康定元年未亦应在朝为官，时石介正居丧在家，二人不太有可能相会。且从其文风来看亦不类介之他作，故为石延年作序者当是苏舜钦。

欧阳修（1007—1072）事迹甚著，从略。修与石介交往甚密。天圣八年（1030）与石介同年登科（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简称《胡谱》）。景祐二年（1035），欧阳修作《与石推官第一书》^⑧，言其在京师频得介所为文，有“好古闵世”之意，但“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劝介不当“自异以惊世人”以贻误后生。石介乃复之《答欧阳永叔书》，为自己辩解，并不认为自己是好异取高。欧阳修以前书所论过略未能达意，又作《与石推官第二书》，重申其意。

景祐二年十二月，杜衍荐石介为主簿，因介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不召（《长编》卷一一七）。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此作《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七），称赞石介“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也”，并责杜衍“自信犹不果”。景祐三年五月，修因范仲淹事贻书责高司谏，被贬夷陵。介因有《寄永叔》诗（卷二）。修路次南京时，介适为南京留守推官，与应天推官谢郭等同邀修小饮于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二五《于役志》）。修庆历三年（1043）有《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张、李指石介之生张绩、李常。据“先生示我何矜夸，手携文编谓新作”句，知此前介曾携张、李二生之文来访，修赞其文但自惭不能荐之。

庆历五年，石介因多预朝政，人多指目，求出通判濮州，未赴，方待次于徂徕。据《胡谱》，修于是年正月始权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事三月。《镇阳读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即作于此间。此诗想象石介返乡讲学徂徕的情景是“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斥佛老，高声诵虞唐”，联想自身，“官荣日以宠，事业暗不彰”，不由生发归隐著书之念。庆历五年七月石介以疾卒于家。次年，欧阳修于滁州作《读徂徕集》诗（《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以怀之。诗云“精魄已埋没，文章岂能磨”，“子生诚

多难，忧患靡不罹”，饱蘸着怀念、悲悯之情。庆历七年六月，介险遭斫棺之难（《长编》卷一六〇）。修闻之后又作《重读徂徕集》（《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诗云：“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子道自能久，吾言岂须镌。”从这种对同道被难反复吟咏的悲愤感情中可以看出二人道义上的相知与推崇是很深厚的。石介逝世后二十一年即治平二年（1065），始克葬于徂徕。修为之作《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虽事隔已久，铭文所蕴藉的怀念之情却丝毫未减。

由于欧阳修后来曾力排石介所倡之“太学体”，在文道观上也与石介有很大区别，所以论者多认为二人从一开始就分歧很大，更没有什么同道之谊。陈植锷认为欧阳修也只对石介的从政和为人作评价，而绝少赞赏他的文章^{①7}。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记载，欧阳修尝对苏洵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意犹有所未足”指石介为文重道少文，但由此可见欧阳修对其所作古文还是比较欣赏的。其实石介生前在斥佛老、排时文上都曾给欧阳修以很大影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云：“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又，《吕氏家塾记》云：“天圣以来，穆伯长、尹师鲁、苏子美、欧阳永叔始创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为杨、刘体者，守道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排佛老。后欧阳公、苏公复主杨大年。”（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引）可见石介在排佛老上导修于先，在变时文上亦助修于后。只是石介过于强调文章的政教之功，矫枉过正，终流于偏执怪诞，故又有后来欧阳修文

道并重的诗文革新。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自号乐全居士。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景祐元年（1034）六月登茂才异等科（《长编》卷一一五），石介作《安道登茂才异等科》诗（卷三）为贺，并将张引为同道。介又有《安道再登制科》诗（卷四）^⑧。虽然石介对张一再推许，张方平却不以其为然。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言：“张安道雅不喜石介，谓狂譎盗名，所以与欧、范不足，至人目以奸邪。”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书（《乐全集》卷二十，详见后“张唐卿”条所引），明确反对石介在太学倡导的文风。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名臣，事迹从略。宝元元年（1038），介仿《贞观政要》作《三朝圣政录》，将上，求质于韩琦（据《长编》卷一二一正月丙寅条，韩琦时任右司谏直集贤院），琦指点数事，介服其清识（事见《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一）。韩琦为之作序，赞介“奉上爱主之心，诚亦厚且大矣！”（《安阳集》卷二二）介又有《上韩密学经略使书》（卷十六），荐引孙复、姜潜诸人。庆历四年（1044）三月韩琦荐石介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长编》卷一四七）。庆历五年石介卒后，妻子冻馁不自胜，琦与富弼又分俸买田以活之（《墓志铭》）。

范讽字补之，齐州（今山东济南）人。明道元年（1032）知青州（《宋史》卷三〇四本传，参《北宋经抚年表》卷二）。明道二年四月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长编》卷一一二四月己未条）。石介有《上范青州书》（卷十五），当作于明道元年或二年。时介父将赴任临朐县令，所属青州。此文即为其父所发。明道二年五月石介又作《上范中丞书》（卷十二）。宋仁宗于是年四月始亲政，石介“踊跃奋悚，不能制其喜”，立即上书范讽，希其尽王佐之才，成尧舜之治。但范讽景祐元年（1034）即被弹奏交结贵

戚而贬官。《宋史》本传言“讽类旷达，然捭阖图进，不守名检，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州逸党’”^⑨。时人颇有对其这种旷达之风不满者，如颜太初作《东州逸党诗》讥刺之，石介门生姜潜亦尝贻书疏其过。这也应是范讽被贬的深层原因。

龚鼎臣（1010—1086）字辅之，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景祐元年进士，为平阳主簿。调孟州司法参军。将仕孟州时，龚向石介请教为文之旨，石介因作《送龚鼎臣序》（卷十八）。石介卒后，诏下兖州验其生死。《长编》卷一五七十一月辛卯条载：“时有诏下兖州核介生虚实，知州杜衍会官属语之，众莫敢对。泰宁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独曰：‘介平生直谅，宁有是耶？愿以阖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怀中奏稿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安可量哉！’”后龚知莱芜县，大臣荐试馆职，坐与石介善，不召（《宋史》三四七本传）。可见二人相知不浅。龚鼎臣亦以学行文章闻名于时，著有《东原集》。刘跂《学易集》卷六《东原集序》云：“自孙宣公、贾存道先生、泰山孙、徂徕石二先生……十数人皆以经学治行大显于时。而公继之，磊落相望立乎大中之途。”龚鼎臣当在道学、文章上受石介影响不小。

张唐卿（1010—1037）字希元，青州人。景祐元年（1034）举进士第一（见注⑦）。韩琦《故将作监丞通判陕府张君墓志铭》（《安阳集》卷四七）云：“君素以文行为东州士人所称……每文章之出，远近为之传诵。与石守道有游，最相知。守道尝有书遗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石介有《与张秀才书》（卷十六），疑即与张唐卿书。称道其为文“始宗于圣人，终要于圣人……尽为文之道矣。”评价甚高。

张方平庆历六年上书《贡院请诚励天下举人文章》，云：“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甚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訕为高，以流荡委

琐为贍，逾越规矩，或误后学。”又，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言庆历间石介“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可见张唐卿的文学主张在石介主持太学时曾大力推扬，但由于矫枉过正，逐渐流于怪诞，于是又有后来张方平、欧阳修等人对“太学体”文风的整顿。^{②③}

王拱辰（1012—1085）字君贶，开封咸平（今河南通许）人。天圣八年（1030）与介同年登科，举进士第一。拜将作监丞，通判怀州。景祐二年（1035）改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刘敞《公是集》卷五一《王开府行状》）。石介有《与君贶学士书》（卷十八）。此文将王拱辰推为“盟主”，云“常思得如孟轲、荀、文中子，吏部，崇仪者，推为宗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张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前……状元力排贬斥淫辞哇声，独以正音鼓唱乎群盲众迷，将廓然开明乎天下耳目……主盟斯文，非状元而谁？”文中洋溢着石介兴绝继灭的热切心情和寻找到“盟主”后的无比喜悦。石介又有《上王状元书》（卷十四），其时石介之父刚刚逝世，而石氏自高祖以降至于六世孙七十丧咸未改葬。石介恳乞王能给予施舍以克葬。其时石介当与王尚有朋友之谊。然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载，庆历四年（1044）王拱辰与贾昌朝等炮制“进奏院狱”，陷害苏舜钦等人，借以将范仲淹等革新派一网打尽，则王在此前当已与石介反目。

石介诗文集中还涉及田况、蔡襄、蔡齐、郭劝、孔圣祐、杨安国、明镐、李纁、李若蒙、范思远、孟执中、张革、范曙、郑师易、君逢、敏夫、徐文、吕国博、郑元、赵延嗣、张安石、张叔文、吕士龙、马永伯、赵禹诸人，限于笔者所见，与石介交游事微，姑从略。

注：

①本书所引《徂徕集》诗文均采用陈植锷点校本《徂徕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后文凡引用时只注其卷数。

②载《责善半月刊》（民国三十一年）第二十期（简称《许谱》）。关于其讹误，参考本文正文相关部分。

③此书中云孙复“年四十七”，当即宝元元年（1038），但杜衍于康定元年（1040）始为枢密副使（据《宋史》卷十《仁宗纪》）。书中又云：“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没”，沂公即王曾，卒于宝元元年（1038），孔指孔道辅，卒于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故此书疑即今年所上。许毓峰、陈植锷二先生俱认为“四十七”为“四十九”之误（见《许谱》康定元年条，陈校本《徂徕集》第159页注）。

④参见《许谱》庆历二年条考证。

⑤《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士熙道本传所引“云濠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四明丛书》第五集，民国廿一至廿九四明张氏约园刊本）。

⑦《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三月戊寅”条云：“得进士张唐卿、杨察、徐绶等五百一人。第四、第五人为大理评事、签书节度州判官，第六人而下并为校书郎、知县。”

⑧陈植锷认为张生既字禹功，当以名“绩”为是，“续”乃误刊（见陈校本《徂徕集》第314页按语）。

⑨关于祖之卒年有争议。《龙学文集》（四库全书本）卷一云：“公卒时元丰八年正月十五日”。陆俊青据洛阳出土墓志铭考证其卒年为元丰七年（1084）（《北宋祖无择事迹考述》（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⑩《宋元学案》作“张洞”，误。参见陈校本《徂徕集》十九页小注。

⑪《宋史》本传云李迪于庆历元年（1041）自兖州知天雄军。《长编》卷一二七则云李迪于康定元年（1040）五月壬戌知天雄。据《贤李》篇知李迪庆历元年尚访孙复于泰山，则康定元年当为任命李迪知天雄的时间，庆历元年为其实际赴任期。

⑫关于此事之评价，参见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卷三（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7页。

⑬陈植锬认为石介此次招祸并非因“妄议敕书”故，而主要是《上王枢密书》中“诋时太过”所致（参见陈校本《徂徕集》第4—5页）。

⑭据《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癸亥条，孔道辅时守南京，诏为御史中丞。又，介文中曰“南走三百里，以驿召阁下”，与《长编》所指相合。

⑮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十三此文后小注云：“黄本、陈本下有康定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十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黄本指黄丕烈过录何焯校本，陈本指陈乃乾过录何焯校本）。

⑯《许谱》将其俱系于景祐元年（1034），周必大庆元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十六目录则把《与石推官二首》系于景祐二年。据《胡谱》，景祐元年三月，欧阳修西京秩满，五月如京师。《与石推官第一书》云：“前岁于洛阳得在郢州时所寄书，卒然不能即报，遂以及今”，又云：“修来京师已一岁也”。“一岁”之后当即景祐二年。《与石推官第二书》又云：“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书，论足下书之怪。时仆有妹在襄城，丧其夫，匍匐将往视之，故不能尽其所以云者而略陈焉。”据《胡谱》，景祐二年七月，修之胞妹夫张龟正病逝襄城，修请假往吊。故《第一书》当作于景祐二年七月间。《答欧阳永叔书》亦当作于此后不久。

⑰参见陈校本《徂徕集》第10页。

⑱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三知张于景祐五年七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介诗当作于此时。

⑲据《宋史》卷四四二颜太初本传，“东州逸党”还包括石延年、刘潜等人。他们为人放荡不羁，诗风亦豪迈雄健。程杰认为石介在精神气质上与“逸党”有着潜在的一致，但在思想风格上仍有区别（参见程杰《北宋京东文人团体及其诗文革新实践》，《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第55页）。

⑳参见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